

画中有话

中央美院诞生的

艺术家们

陈琦 何秋言 编著

中央美术学院自成立近百年来，在中国美术教育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诞生艺术大师无数。由该院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能成为一名该校的学生是学习美术的最高梦想，让自己为梦想而奋斗吧！

走出名校丛书 主编 石一宁

画中有话
中央美院诞生的
艺术家们

陈琦 何秋言 编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中有话:中央美院诞生的艺术家们/陈琦,何秋言编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216 - 05842 - 1

I . 画…
II . ①陈…②何…
III . 画家一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126 号

画中有话 中央美院诞生的艺术家们

陈 琦 何秋言 编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126 千字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数:1-5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842 - 1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9.25
插页:1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成功的学院拥有恒定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代表学院水准的师生身上凝聚。学院因师生的卓越而闻名，师生以树立学院的品质为己任。走进中央美院，师生身上沉淀着学院长期浸润的品质。一个玩笑，可能皆是学院“规范”所至，这里所说的“规范”并非普遍性的行为规则，而是专业素养、学院文化等凝聚而成的自愿约束机制。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是美院人之所以是美院人的根本所在，也是他们取得现有成就的根本。体现这一品质是笔者组织文稿的出发点所在。

此次选择的人物当然只是“美院人”的几个代表。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有其必然因素，其艺术成就正如书中所示，一目了然；也有偶然因素——书籍容纳量有限、笔者能联系到的人物有限等等。但这样的一个选择也是笔者综合考虑的结果，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管窥中央美术学院的视角。希望这样一个视角能让读者发现“不同的”美院。

同时，在此对书中所写各位艺术家不吝时间予以配合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挚友刘礼彬、薛梅、黄汉成、吴铮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给予的协助和支持也令我们感动至深，由衷地谢谢你们！



目 录

MuLu

- 一 “出走”的画家：陈丹青 /1
- 二 江大海：万里乘云去复来 /20
- 三 滕菲：飞花摘叶皆可动人 /32
- 四 中国新写实主义代表：王沂东 /44
- 五 方力钧：我想像野狗一样生活 /62
- 六 年轻勇猛的艺术“闯入者”：尹朝阳 /80
- 七 夏俊娜的花样年华之异度空间 /101
- 八 时光的体验者：王光乐 /117
- 附录 辉煌百年——中央美术学院 /134



一

“出走”的画家：陈丹青



陈丹青经典语录

中国文艺很荒凉，瘦得只剩肱二头肌，疙瘩肉。瞧着挺壮的样子，看上去繁花似锦。就像中国体育，全世界拿金牌，可是社会上哪有体育？人民哪有体育？到处拿奖的“体育”是中国最壮的一块肌肉，其他部分瘦得要死。

我近年发稿出书，一字一节斟酌再三；到编辑那儿，我这边每必声明：尽管删，尽管删！编辑那边呢，嘴笑着，眉皱着：唉呀我们也没办法呀，要生存呀，谢谢你理解呀！最好玩是电视制作人：陈先生，放开了说！说啥都行！我们后期会处理的，您放心！

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重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城市景观，全毁了。有哪个古老国家这样义无反顾地糟蹋自己的帝都，抹杀自己的历史？开罗？马德里？伊斯坦布尔？罗马？巴黎？京都？奈良？彼得堡？没有。没有一个古老的都城像咱们的北京这样持续毁容，面目全非，恨不得把北京的模样全给改了。北京 1996 年到现在每年拆六百条胡同。

人人生而平等，那是法国人的口号，是愿望，不是事实。你双眼皮，我他妈单眼皮？人从娘胎里一钻出来就不平等。关键是要让悬殊差别的社会建立一个体现公正的机制，社会上的财富，让穷人也能受益。公正不可能，平衡可能。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贫富悬殊，是不公平，不平衡。

——陈丹青

5年前，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这位原本是艺术家身份的陈丹青，因为这次的辞职风波，使他在艺术圈赢得了广泛的尊敬。皇帝新衣的故事给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度最贴切的注脚，人人都看到了研究生教育的衣不遮体，陈丹青偏偏选择了像孩子一样的坦诚。

对于陈丹青，不同的人谈论他有不同的心态，惋惜、挑剔、困惑、暧昧以至于愤怒。他的背后总有那么一群人在指指点点。或许，他真的太引人注目了，或者说太“张扬”了。陈丹青却说，“如果中国还有真正意义之公众的话，那么公众看到我张扬，都是因为媒体的作用，是它们替我张扬的。”

“辞职风波”之前，陈丹青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画家。1981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中展出的《西藏组画》和四川油画家罗中立的《父亲》成为新中国油画的“巅峰之作”。陈丹青于不动声色之中，对文革以来的主流油画创作模式进行了疏离和反拨，有人认为《西藏组画》意味着一个油画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油画神话的终结。

《西藏组画》的横空出世让始终有溯源情



西藏组画·进城之一
纸上油画 1980年



西藏组画·牧羊人
纸上油画 1980年

结的国中同道心醉神迷。而陈丹青 1978 年以初中学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1981 年即自费赴美的生活经历又有一种传奇色彩，让当时身处封闭环境中苦苦追寻的人们心仪倾慕，于是，陈丹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认为是当时最具才智的青年油画家。甚至许多人知道现在仍有“陈丹青情结”。对此陈丹青本人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根本不懂西藏，前一次进藏，我当成是‘苏联’，后一次进藏，我干脆当成是‘法国’了。要是没有去西藏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做出别的什么事情。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又是假想的欧洲绘画。”

[学艺之路]

“根据心理学的说法，一个人毕生的作为，不过是演绎他十四、十五岁时怀抱的梦想：那正是我初习油画的年龄，我发现我所有作品果然是以曲折延伸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将我带回少年时代的梦。”

大凡真心喜欢画画的人，都源于自己心中的一个画画的梦。

陈丹青算是画画梦做的最沉最痴迷的一个。

观者走进他的作品，走进他的梦，我们能看是什么呢？

1953 年 8 月，陈丹青出生于上海，16 岁之前，陈丹青住在上海，他说：“我的第一语言，我的潜在记忆，全是上海，虽然不是上海本地人。但上海印象是如此的深刻，直到 1992 年，陈丹青才发现，上海曾是多么西化的城市（世纪初的那种西化），这才想起为什么出国前还跟几位在北京的西方留学生说，他们遍游中国，驿道上海，就想家，想起他们在欧美的母国。也想起为什么我到纽约、伦敦会觉得不陌生，到意大利甚至会觉得来过，我这也才省悟到我喜欢油画，而且是这样一种喜欢，同上海的种种潜在关系。”

这种潜在记忆(文学上有个更好的说法,叫作“前世的回忆”),是要出去很远,出去很久,才会被唤醒的。当被唤醒时,我的眼睛已经不一样了——记忆,也不再是原封不动的那些东西,那些意义。

当时中国正好处于特殊的社会时期,许多人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时代的祭品”。对于还处于青春期、满脑子胡思乱想的陈丹青来说,他能做的只是用一支普通画笔,最大限度地配合和抒发整个国家的追求和想象力。陈丹青说:“(当时)若要表现一个非常大的场景,还得需要油画家。”

小学毕业两年后,十多岁的陈丹青就跟着中学教美术的恩师辛明炎先生,在油漆的大铁皮和水泥上画毛主席像,老师手把手地教他画油画,还告诉他很多欧洲美

术大师的名字。少年时的他无书可读,老师的教诲远胜于书上读来的知识。除了四处画朱熹像,就是临摹。凡能借到的画册资料,他都临摹一遍,不管是素描、油画,还是连环画……他的心得是:“初学画艺的最佳方式即下手临摹,一如旧时儿童的读书,劈头便是背死书。”



牦牛群 1976 年

次借到一幅达·芬奇的素描临本,半天就得归还,便一个人缩在外婆的床上用铅笔细细临起来,画好后用饭粒粘在一张硬纸上,看了又看,甚为满意。这幅小画,如今纸质已发黄,画中的线条运用纯熟,明暗层次微妙,结构严谨。透过玻璃镜框细看,似乎有点像在欣赏达·芬奇原作的感觉。除了临摹达·芬奇,还临米开朗基罗,还临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画家的作品。在他少年的记忆里,他的绘画基础训练就是文革初期邂逅的欧洲绘画,是在民国出版,经由红卫兵抄家而流传社会上的画册。

陈丹青如饥似渴地学习画画,一面临摹,一面写生。第一次油画景物写生,画

了一个白瓷盘，盛着三只番茄。而他的志趣在人物，所以画了这三只番茄之后，就不记得还画过别的静物画了。

1968年，他画了第一幅布面油画自画像，那是在临过《意大利女孩》肖像之后，大为得意，即按照同样的面部角度和明暗调子画了一幅自画像。画好之后，同样十分得意，便揣着画去看在单位接受审查的父亲，在楼墙后的台阶上，背着人给父亲看。父亲说画得好，还说耳朵画得很像。陈丹青永远感激他的父母，从幼年起，他的学画梦就受到父母的鼓励和夸奖，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他就这么一刻不停地画着，勤奋、热切、认真。

陈丹青说：“人有人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与所有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一样，陈丹青到了江西赣南宁都县插队落户，“从16岁到21岁，将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交给江西了。”

不管是“文革”初期的初中阶段，还是下放江西宁都插队、江苏江浦落户，还是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也不管是在西藏、内蒙古，还是美国纽约。他说“在美国的十八年中，除了周日或旅行，几乎天天画画，忙碌而平静，愚蠢而快乐。”

谈陈丹青，谈他的艺术，就不能不谈速写。他画速写，极重感觉，他说：“速写是

西藏组画·进城之一
纸上油画 1980年



一件自觉的勾当，三分技巧之外，最可宝贵的就是敏锐的感觉——当时的，再加上作者的际遇。”他画起速写来，不计较手段，也无所谓式样，简单地说就是：直接、坦率、迹近潦草，但下笔迅速，瞬间画就。这种感觉落于纸上，画面洋溢着的是作者迸发出来的才情和气息，事后往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画成的。

陈丹青的速写、草图和创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西藏组画》的创作中，很多速写直接用到草图和油画里。展出一组草图，很有速写的韵味，保持这速写中人物的火气、神智和动作。《康巴汉子》的造型就是从二十几幅速写中选出来的。他的创作草图和信纸大小一样，一开始就把眉眼、手脚、衣纹都尽现出来，在打腹稿和草图上下大功夫，而由草图变油画正稿反而相对简单。《进城》的素描稿斟酌数月，而上油画正稿仅画了两天。

陈丹青说：“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我对西藏既不了解，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历史常被误读，西藏

组画被神话，也是出于误读吧。”

1980年，陈丹青二度进藏，作《西藏组画》。这次进藏，他没有画一幅油画人像写生，有几张油画小头像是根据速写翻成的。他认为，如果到一个地方，想画一些创作，那最好别画太多的写生，至少别光顾着写生。创作既不全是想出来的，也不全是画出来的，倒有可能是看出来的。

他在街头看牧民进城、朝圣、买东西，在速写描绘他们，感受他们，在草图中追寻心中的清晰优美的印象。艺术要抓住，往往既不是眼前见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也不是未见过的杜撰的空虚的生活，最好的莫如印象中的刻骨铭心的至情至性的生活。一个没有去过西藏的人，一个没有对生活充满痴情的人是画不出这些画来的。

和陈丹青同学，有近30年交情的现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孙景波对他的评价带着更多的赞誉，“他做事很认真，他是个坐得住的人。”成功者大都是能沉得下心的人，陈丹青的突然成名并不让圈内人感到意外。“1976年我到过南京，在亚平先生家里就看到他的画。”孙景波回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

个人，但对他画已很是欣赏。”而在《西藏组画》声名大噪之际，陈丹青离开了中国。此后，他成为中国艺术青年遥远的楷模。

1980年，陈丹青27岁，他说：“这一年有两件事对我很要紧，一是‘法国乡村油画展’来华展出，我终于目睹库尔贝、柯罗、米勒的原作；一是进入文革后

重新招生的中央美院……当我画《西藏组画》时，我知道，少年时可怜而虔敬的临摹记忆，被那次法国画展唤醒了。对自己的学艺之路，陈丹青说：“生命的轨迹，不可能完全按自我主观意图运行。去西藏去内蒙古，在我都是偶然的机缘，都不是我自己想要去而去的，美国也不是自己想去的，只为看欧美油画原作。”

与陈逸飞： 他不是左拉，我也不 是塞尚

逸飞的性格、活动能力，可以在多个领域长袖善舞，美术界难找到第二个人……只是，他走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从此上海少了一个话题。没人相信中国的艺术界可以有人取代这个话题。

陈丹青说：“逸飞长我7岁。我19岁那年认识他，那时他才26岁，时在1972年，距今33年了。我不是塞尚，陈逸飞也不是左拉，青少年时候的朋友，特别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不可替代的。”

陈逸飞在当时的上海美专是公认的三大才子之一，谁都想结识他。上海油

画雕塑创作室女才子刘耀真是陈丹青和陈逸飞之间的引见人，那天阳光正艳，刘耀真送陈丹青到画室大门口，说你自己进去吧。只见逸飞正从大画布前退开远观，陈丹青竟一时羞怯，回身退出来。因为他觉得这太让人激动，太神圣了。

那是一个很大的画室，陈逸飞站在一块画布前面，观察自己的新作。他的专注让陈丹青能够冷静下来观察他。陈丹青说：“我没想到那么有名的一个画家，看起来会这么年轻，他的外貌是标

准的好青年，戴副眼镜，像个高中生，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陈逸飞匆匆地瞄了陈丹青一眼，又继续作画，但是这一眼却使得陈丹青再次吓得退出画室来。

结果还是刘耀真领陈丹青进入，介绍过，他就看陈丹青携去的画，片刻便熟，陈逸飞和陈丹青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的小青年画画都很不错嘛，下次再来玩啊”，用上海话说就是“白相”，这样，陈丹青渐渐成了陈逸飞画室里的常客。

这一场景陈丹青总想记下，那夜陈丹青写日记，写了两回，只恨写不像，终于没记完。

有次去见逸飞，他正画双联画《红旗颂》油稿，其时陈丹青从未见过那么大的画，竖着，高约3米，一枚画临阵宣誓的三位士兵，一枚画纪念碑前敬礼的

新中国女孩。陈丹青说为首那女的真好看，逸飞咧嘴笑道：是我老婆呀。我这才知道陈逸飞已婚，但瞧着却只像大学生。

与陈逸飞亦师亦友的关系，开始于陈逸飞开始和魏景山合作《鲁迅》的时候，一天逸飞忽然叫陈丹青去，说你耳朵蛮好，鲁迅侧面这只耳朵，你来给我对着画画看。一早去了，居然画到下午，历5小时，只是描那只耳朵。

因为陈丹青在江西已经画过一两本连环画，所以又被逸飞叫去，说是陈丹青画过连环画，会构图，帮他俩弄弄看，于是当场勾来勾去。出版后他到处跟人说：呶！构图是这小鬼弄的呀！同年，陈丹青在江西实在混不下去，他说不要紧，我来想办法，当即给苏州朋友杨明义写信去，后来再加好几位师友一帮衬，居然真的混到江北农村落户了。

陈丹青常说，如果没有陈逸飞，就不会有今天的陈丹青。学生时代的他，常受到陈逸飞的启发和指导。辗转到江苏之后，得以继续从事他的绘画事业，并在那里与妻子王松宁相识，随后夫妻两人便去了西藏。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才使陈丹青后来创作出了让他成



泪水洒满丰收田 1976年

名于画坛的《泪水洒满丰收田》和《西藏组画》。

而后，陈丹青与陈逸飞二人先后去了美国。在陈丹青去之前，他只有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亲戚，连中文都不会说，还是陈逸飞拿着地址跑到对方家里，为他联系出国的事，这对当时的陈丹青来说十分关键。

在美国的日子，两个人常常见面，一起聊画画、技巧、笔触。陈丹青还记得陈逸飞对他说：“丹青你看着，以后我肯定会画得圆进去一些，这样更有层次。”

除了画画之外，两个人还去过卡内基音乐厅听帕尔曼的小提琴，当时由于没吃饭，两个人就着逸飞爱人包的肉粽在车上解决了一顿。吃完了粽子听帕尔曼，这个奇妙的画面长久地停留在了陈丹青的记忆中。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83年的一天，一场并不因为两人之间谁对谁错的误会，让这对亦师亦友的海派画家，在美国纽约陡然翻脸成仇。因为这一场误会，两个人之间差不多有整整15年没见上一面，即使偶然见到了，也从不说话，非常尴尬。这件事至今让陈丹青想起来就难受，也不再愿意道出其中的原委。

直到1998年，在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两个人再次相逢了。陈丹青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98年是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了中国五千年的大展，我和他都有作品入选。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一层层窄窄的圆圈，这就叫做狭路相逢。见到陈逸飞之后，我们俩先是打了个招呼，但是没多说话。后来开幕式时我们



坐到了一个餐桌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观察他，因为只要看到一张老朋友的脸，所有的往事都回来了。我会想起我们过去在一起，他总是跑到二楼来，边跑边喊‘丹青、丹青’。这是多么熟悉的人啊。等到再一次，我们在现代馆见面的时候，我对我太太说，我们过去吧，该和他说说话了。当时一群人围着他，他穿着非常好的西装站在人群中间。我们跑过去叫他：‘逸飞。’就这样，我一直在很近的距离看着他，但是他很快被人叫走了。”

陈丹青说到这一段时十分动情，他继续回忆说：“此后我回国，在拍卖行或是在一些活动上，也跟他有过两三次见面。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消除掉了，但是却没有机会和他单独谈话。如果只剩下我跟他，我想我会非常着急地告诉他：‘你的电影不好，我要告诉你不好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也会把好的地方告诉他。说到电影，其实是逸飞很早前的心愿，记得那时他曾对我说：‘丹青我老实跟你讲，我顶想做的不是画图画！’忽一日逸飞下巴扬起来，凛然语告，‘我总有一天要来拍电影！’所以逸飞早有念头在，据他说法，其实还要早，

是他中学有次跌了腿，久卧床上，弄一叠电影画报翻来翻去看。少年人迷一件事情，不奇怪，若是此后上了心而果然做，便是有志气。中央美院王式廓，画着画着，忽然掼倒在地，死了。香港李翰祥是在拍片现场弯腰瞄镜头，忽然胸口闷，歪倒死了。这是我顶佩服的死法。到我现在的岁数，虽不算怎样老，时或便有同辈的死讯传过来，可哪会想到是逸飞！他死在工作的当口，一条性命，凛然交给‘拍电影’。我晓得有人不服陈逸飞，那么谁也来这样子死死看！”

“不仅如此，我还会告诉他，我怎么看他后来的画，因为他似乎跟其他朋友说过，丹青现在不睬我了，没有能够跟我讨论画画的事情的人了。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在说这个事，说你这笔触不对，说我用油用得太多了，一天到晚都在讲这个”

陈丹青说：“从 1983 年到现在的 22 年中，其实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开始一次新的沟通，但是一直没能进行。我至今都很遗憾。”

陈丹青曾提起一个故事一直很让他感动，就是塞尚和左拉。“他们两个人都是普罗旺斯镇的中学同学，一个喜好文

学，一个喜好画画，后来一起到了巴黎，他们俩的交情十分的好。在印象派闹事的时候，左拉还仗义执言帮塞尚说话。可是到了两人中老年的时候，左拉写了一本小说，以塞尚为原形，暗示他是一个失败的天才。塞尚大怒，觉得受了老朋友的曲解和侮辱，于是两个人绝交了。没过多久，左拉死了。到他死的时候塞

尚才发现，自己原来非常非常舍不得左拉，左拉的离去，带走了他整个青少年时代，以及对艺术的回忆。当然，陈丹青不是塞尚，陈逸飞也不是左拉。青少年时候的朋友，特别是亦师亦友的那种关系，是不可替代的。正如陈丹青所感触至深的：“我想这是很难说出来的一种感觉，尤其是，他这么快就去世了。”

“游走”与“出走”

在很多人眼里，如今的陈丹青似乎已不是画家，而是一个写作者。因弄出一本《退步集》，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几篇“猛文”以及坦诚、机智的独特陈氏文风为他赢得了一批读者。在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陈丹青签售了三本新书。两本修订版《多余的素材》、《纽约琐记》和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与陈丹青交谈》。见面会上陈丹青说：“三本书出来后，我想起自己还是个画画的。我已经走得太远，需要反省一下。”身为画家，陈丹青回国后的新闻却都

与绘画无关。

“我已经走得太远，需要反省一下。”说到“走”，今人看陈丹青，会发现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的艺术家的确是以“走”闻名。从走入西藏开始、去美国、再回国，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的陈丹青走进清华园作了教授，五年后又愤愤然地出走了。身为画家，却屡屡出书，陈丹青以独特的文化人形象游走在两种身份之间。身份背后，其实牵连的是艺术家本人的耿直秉性和人性魅力。